



张和平

我本清静

凤凰树下

随笔集

张和平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我本清静

凤凰树下

随笔集

张和平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本清净/张和平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7

(凤凰树下随笔集)

ISBN 978-7-5615-5640-5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6724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总编办电话:0592-2182177 传真:0592-2181406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真:0592-2181365

网址:<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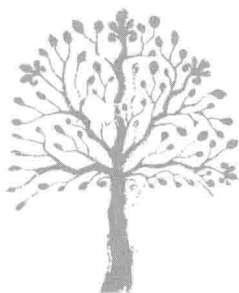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5.25 插页:2

字数:228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3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厦门大学，一所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经过近百年的岁月洗礼，她根深叶茂，茁壮成长。厦大校园背山面海、拥湖抱水，早年由南洋引入的凤凰木遍布校园的各个角落，于是，一级又一级的海内外求知学子满怀憧憬地相聚在凤凰树下；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依依惜别于凤凰树下。“凤凰花开”成了学子们对母校的青春记忆，“凤凰树下”成了厦大人共同的生活空间。

建校近百年的厦门大学现已成为学科门类齐全的国家“211”、“985”工程重点大学。厦大人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铭记校主陈嘉庚建设一流大学的嘱托，在较少政治喧闹、较多自由思考的相对安静环境中，做着相对纯粹的真学问，培育着一代代莘莘学子。一大批厦大人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里成果卓著，他们除了发表论文、出版专著，贡献自己高深的科研成果之外，亦时有充满灵性的学术感悟文字、感时悯世的政治评论短札，时有思索道德人生的启示益智言语、情感迸发的直抒胸臆篇什。这些学术随笔其

文字之精练,语言之优美,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不仅体现了厦大学人深厚的学术积淀,而且也是值得传承的丰富文化宝藏和宝贵的出版传播资源。

厦门大学出版社秉承“蕴大学精神,铸学术精品”的出版理念,注重挖掘厦门大学的学术内涵。我们将以“凤凰树下随笔集”的形式,编辑出版厦大学人的学术随笔、学术短札,在凤凰树下营造弥漫学术芬芳的书香氛围,让厦大校园充满求真思辨的探索情怀。年轻学子阅读这些书札,或能获得体悟,受到激励,走向深邃的学术殿堂;社会大众阅读这些书札,或能更加切实地品读我们这所大学的真实内涵,而不至于停留在“厦门大学是个大花园”的粗浅旅游观感层次。

我们更期待《凤凰树下随笔集》走出校园,吸引全球更多的学者走入这片凤凰树下,让读者感受到这些学者除了不断有高精尖的科研成果问世外,还有深沉的文化艺术脉搏在跳动,还有浓郁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在流淌。

厦门大学出版社



Contents

目 录

- 1 〉 引言：有“我”的人生才“清静”
- 12 〉 留在手脚上的记忆
- 13 〉 “吃亏是福”
- 14 〉 有心人
- 15 〉 生命的节律
- 16 〉 因“游”而得“逍遥”
- 18 〉 “大美不美”
- 21 〉 有效生命
- 23 〉 因舍而得
- 24 〉 天才最痛苦
- 27 〉 活得有性格
- 28 〉 “游于艺”
- 33 〉 “家”在何处
- 34 〉 “心若在，梦就在”
- 36 〉 我们拿什么证明自己值得一活
- 38 〉 得失之间
- 39 〉 我们被谁欺负了
- 41 〉 是“绝对理念”在唱
- 43 〉 找回真实的自己
- 45 〉 活在生命的“小”中
- 47 〉 “气”学散步

- 49 > “天才”很“天真”
- 52 > 是一文不值还是无价之宝
- 55 > “天籁”谁吹
- 57 > 面对人生的“败笔”，你准备好了吗
- 59 > 大齐大平
- 60 > 找到自己的“位子”
- 62 > “大人”少吗
- 64 > “想”出来的相貌
- 66 > 万物皆有“背面”
- 69 > 世界只对什么样的人袒露真相
- 71 > 有感于动物自亮“软肋”
- 74 > “意态由来画不成”
- 76 > 做到“合理合法”就够了吗
- 79 > 要活出我们的“节奏”
- 82 > “平常心即道”
- 84 > “我是谁”
- 87 > 官场“阴阳人”
- 89 > 御寒“小棉袄”
- 91 > 美在不“言”中
- 95 > “非主题性”生存模式
- 97 > “理性”的困境
- 98 > 美好生活的“分量”
- 99 > “活在当下”
- 102 > 不要“笑得过早了”
- 105 > 说“痛快”
- 108 > 你得个什么就享福了
- 111 > 到底什么东西是被给定的
- 114 > “太上无情”
- 117 > 中国文化的殊胜之处
- 119 > 生的幸福是一个常量
- 122 > “至虚而至实”
- 126 > 谁是真正的幽默大师



- 130 > “心”是我们最危险的财富
- 133 > 如蝉般清澈而凝定的生命
- 139 > 中国人,你太急了
- 143 > 让禅为我们打开心结
- 147 > “九九归一,一归何处”
- 151 > 中国社会到底怎么了
- 154 > 我们手中的“魔戒”
- 155 > 随“造化”作“无穷之游”
- 163 > “数目化管理”与学人的相貌
- 166 > 回家真好
- 167 > “过年”说“年”
- 169 > 失真的“看脸”社会
- 173 > 如此撕扯的人生
- 175 > 要善于作人生的减法
- 178 > 好可怕的“手套”
- 180 > 向我们这个社会的脊梁们致敬
- 183 > “只有山歌敬亲人”
- 186 > 你的爱成了别人的商机
- 188 > 酣睡在天地之间
- 190 >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
- 194 > 附录一 “天籁”新解
——兼论“天籁”与庄子哲学
- 213 > 附录二 “格物致知”释论
- 233 > 后 记



引言：有“我”的人生才“清静”

要是有人问我：“当今中国人最缺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最缺‘我’！”这一回答可能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人们看到的中国人往往都活得太有“我”了，说他们缺“我”，那地球上就没人敢说不缺“我”了；他们财大气粗，招摇得不行，花钱都是大手笔，一出手就能将某奢侈品商店搬空；在一群出国游的人群当中，就中国人嗓门最大，“自我”得旁若无人；在公众场合，他们想干点什么，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甚至也不考虑会有什么后果；他们终日都在为他们的那个“我”打拼着，既为“我”的名，也为“我”的利、“我”的流芳百世……；至于各种各样的“中国式”，比如中国式插队、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涂鸦、中国式扔垃圾、中国式逆向行驶，等等，无不说明中国人不但有“我”，而且已经到了只有“我”的地步。对此，我要说的是，中国人的种种表现，恰恰是他们缺“我”的有力证明。这里的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缺“我”才导致他们以近乎疯狂的举动对他们的缺“我”人格进行补偿，其情形与一个极度自卑者往往会用极度“自尊”的行为来加以补偿是一样的。所以，在时下中国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我”，其实不是真正的“我”，倒更像是佛教所说的“我慢”或孔子所说的“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之“我”——一种因“我”的变形所导致的“自我”无限膨胀与无限固执。

那么，我所说的“我”到底指什么呢？这个“我”不是别的，它就是构成我们人生最内在的生命之维（或称“原本的我”亦可），是一个人最切“己”、最真实、最生动的东西，借用古人的话来说，它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内充”的“气”（一个人可以借助幼儿看他的眼神来判断他是否拥有这种“气”）。有了它，生命才充满了“动人的活气”（方东树《昭昧詹言》即谓：“观于人身及万物动植，皆全是气所鼓荡，气才绝即腐败臭恶不可近”）、“温润的暖气”、“醉人的和氣”、“优雅的灵气”。一个人若能使此“气”得以“长养”，他就是一个能体、能感、能知、能明、能爱的人，而且他的行为总是能做到恰如其分，直至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相反，一个缺“我”的人总是显得干瘪而扭曲，以至于一个人不应该有的东西他几乎都有，而应该有的东西他却很少有，这种人尤其缺“爱”，因为历来的“爱”都是始于“推己及人”的，这种人由于缺“我”，所以他是无“己”（“我”）可“推”的，表现为他不但不会主动去爱他人，也未必真爱他自己（一个“容”不下他人的人其实也是“容”不下“我”的，反之亦然）。进而，“贫瘠”、“干涸”甚至“残酷”便构成了这种人的基本人格特征。一个人可能不懂得“我”对于生命的意义，但他绝不可能不懂得水对于土地的意义：当土地还能留得住（“容”得下）水分的时候，这片土地便景色宜人、生机勃发，而当土地中的水分都流失了，这片土地就变得“残酷”无比，不仅它自己长着一副“残酷”的脸（指它干坼的样子），它上面也变得寸草不生。水对于土地的意义也就是“我”对于生命的意义。

古人早就懂得为生命“保墒”的重要性，道家的“保己”、“不失己”、“安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儒家的“守仁”、“为己”、“成己”、“反求诸己”、“反身而诚”、“存心”、“养性”，禅家的“明心见性”、“发明本心”、“贫子认家门”以及（寻找人的）“本来面目”、“自家田地”或“来时路”皆属对此重要性的强调。在古人那里，这个“墒”除了被称为“我”（如孔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老子的“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庄子的“万物与‘我’并生，而天地与‘我’为一”等等即是）之外，还被称作“己”、“气”、“仁”、“德”、“性”、“中”、“心”等等。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强调已经构成我们这个民族传统智慧最核心的话题，将民族的人文始祖命名为“伏羲”如此，对“格物致知”的强调如此，对“中庸之道”的强调亦复如此。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我们的人文始祖何以叫“伏羲”大感困惑，自从接触到《庄子》之后，答案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原来，“伏羲”一名为庄子首创，乃庄子的哲学范畴名，与其所谓“保己”、“抱一”、“抱德”、“抱神”、“葆光”同义，故“伏羲”又名“包羲”或“包牺”，“包”、“保”可通，“羲”有“气”义，复有“我”义——很显然，“伏羲”背后其实就是一个与“保‘我’”有关的话题，以“伏羲”为人文始祖，恰好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向来都是将“保‘我’”视为人生的第一要务。“格物致知”出自《大学》，其所强调的无非是：将生命中多余的“物”“格”出去，以便为“我”的回流腾挪出足够的空间。“中庸之道”实即“中和之道”，故《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由此可见“中”原本是一个多么“切身”的字眼，只是当它被后人作了五花八门的解读之后，形而上的味道越来越浓，进而也就变得不那么“切身”了。其实，“中”指的就是与作为生命外在之维的“和”相对应的生命内在之维，是生命的“原点”，或者更直接地说，“中”就是“我”，而所谓的“守中”、“养中”无非就是强调要守住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感表达都异常“切身”的“我”：“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孔子）一个人所拥有的“我”越“原本”、越“切身”，那么他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就越能做到“心中有数”或“心中有底”，表现为他不仅对是非曲直的判断具有极强的“我”性（原则性），还表现为他的行为总是那么的“恰到好处”（恰好命“中”）。相反，一个人若是丢失了最值得他信赖的“我”，那么，信“他人”也就成了他的必然之选。信“他人”原本并不可怕，甚至也无可厚非，但在无“我”的情况下忙不择路地信“他人”则是可怕的，因为它将导致生命的“失和”：其一是我与“我”的“失和”，其二是此时之我与彼时之我的“失和”。我与“我”的“失和”使我经常做“违心”之事，此时之我与彼时之我的“失和”又导致我的行为缺乏内在一贯性。这种内外都“失和”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格分裂”的人。故而，无“我”（“己”）之人是注定要承受“人格分裂”之苦的：“不见其诚己而发，每发而不当。”（庄子）换成“中和之道”的说法就是：没有内在之维的“中”，就不可能有外在之维的“发而皆中节”之“和”。与无“我”之人不同，有“我”之人不仅其“中”是“正”的，“心”也是“在”的，“中正”、“心在”就确保了生命外在之维的“和”，所谓“正心在中，万物得度”（管子）、“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谓之圣人”（管子）说的都是这个道理。在《中庸》一书中，有“我”之人被称为“尊德性”之人、“明明德”之人或“德润身”之人，而无“我”之人则被称为“心不在焉”之人。所以，《中庸》以“修道”为手段，以“率性”或“尊德性”、“明明德”为目标，其本意始终落在为人生找回那个能感、能体、能知、能明、能爱的“我”上。

“我”的有无直接决定了人的精神气象：一个人有没有“我”，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气象；一个时代有没有“我”，决定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一个民族有没有“我”，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象。懂得推出“伏羲”、“格物致知”、“中庸之道”的古人，他们的确就比我们活得有“我”，因而也就比我们活

得有气象。别的不说，仅庄子笔下，我们就见证了诸如老子、孔子、颜渊、曾子、子贡、子路等等人物，他们个个都因为“我”的内充而将自己活得既真切动人又风貌宜人。至于庄子本人，则更是将“温润的感性”、“犀利的理性”、“优雅的灵气”乃至“孩童般的稚气”尽皆活出来的人。对此，闻一多先生是早就有过结论的：“有大智慧的人们都相信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却不像庄子那样热忱的爱慕它。在这里，庄子是从哲学又跨进了一步，到了文学的封域。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羨，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由于做到了“我”的“内保”、“气”的“内充”、“心”的“内定”，致使庄子所看到的世界总是比别人真切：“他形容马‘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踢’；又看到‘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他又知道‘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规，二旬而叶成’。”（闻一多）他那酣然自足、“无可无不可”的意态更是对有“我”之人的最好诠释，而与专事矫情与反向补偿的无“我”之人大异其趣：“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庄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人同样强调人要活得有“我”，他们将有“我”之人称为“自我实现”的人。两相比较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庄子恰好就是西方人所要寻找的“自我实现”的人：“自我实现者具有奇妙的反复欣赏的能力，他们带着敬畏、兴奋、好奇甚至狂喜，精神饱满地、天真无邪地体验人生的天伦之乐，而对于其他人，这些体验也许已经变得陈旧。对于自我实现者，每一次日落都像第一次看到那样美妙，每一朵花都温馨馥郁，令人喜爱不已，甚至在他见过许多花以后也是这样。他所见到的第一千个婴儿，就像他见到的第一个一样，是一种令人惊叹的产物。”（马斯洛）

在《庄子》一书中，有“我”之人就是有“道”之人，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德充”之人；无“我”之人就是失“道”之人，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失性”之人。无“我”之人由于丧失了沉甸甸的“德性”，所以他们的人生也就丧失了应有的定力，致使他们注定就是“墙头草”，也就是庄子所说的“风波之民”。“风波之民”往往经不起一点“风波”，稍有“风波”，他们就一会儿倒东一会儿倒西，承受着人生无尽的“颠簸”之苦。庄子笔下的东施就是一个典型的“风波之民”：这位貌丑的姑娘，由于她不尊重自己的“我”，认识不到“我”作为一个独



特存在的唯一性和神圣性，因而不知道如何去成就“我”，而是企图把她的“我”全都抛弃掉，转而认同并仿效大美人西施。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她的伪行为是在完全撇开了“我”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显得极其的造作和不自然，结果终于导致了因怪模怪样的效颦而貽笑邻里的不幸结局——她本来是应该而且也可以成为她自己的“我”的，但她却不安分地想把“我”塑造成别人的一个赝品，结果，她忙活了半天，却把自己给演砸了；进而，她蒙羞了，她使自己远离了“幸福”。东施的不幸结局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人一旦将“我”弄丢了，各种各样的假“我”（赝品的“我”）注定是要乘虚而入的。何止是东施，在庄子看来，自三代以来，人们都挣扎在丧“我”的边缘，“以身（我）为殉”的“失性”之人所在皆是：“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失性”的丧“我”之人总是处在“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庄子）的状态中，他们虽然整天忙忙碌碌，却从来不敢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一味地只是人云亦云、人要己要地活着，这样的人生岂能“不悲”、“不哀”：“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庄子）。庄子能声嘶力竭地控诉丧“我”的人生，恰恰说明他自己的“我”还流失得不多，或起码可以说明他是一个为重新找回“我”而抗争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人”为本位的文化，所以对于“人”之为“物”，“传统老人”早就“烂熟于心”了，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这只大缸中沉淀了比我们的想象要多得多的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后人细细加以咀嚼。人生实在太玄妙，是非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稍不留神，我们就有可能将我们的人生搞得“南辕北辙”。故而，向古人汲取生存智慧以摆脱无“我”之苦，这已成为我多年来最关注的事。但不曾想到的是，这一过程却伴有太多的纠结与无奈：我刚从古人的字里行间找到了久违的神清气爽、身心俱畅的感觉，一旦回到现实，又重新陷入“虑多志散，知多心乱”的煎熬中。现实中找不到一个“古之学者为己”的“古人”，到处都是“今之学者为人”的

“今人”。以至于“我”就像是身处已经干涸沼泽中的鱼，虽然偶尔也能喜得几滴甘露滋润，但这点“相响以湿，相濡以沫”的“幸福”又怎能抵折得了那“相忘于江湖”无限惬意！我的生命失去了“我”的内充，也就变得干瘪而扭曲了，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徒有其躯壳而已。施伟策有关现代人不幸命运的描述似乎专门就是针对严重失“我”的我而发的：“现代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失落在芸芸众生之中，这也许就是现代人最典型的特征。他对其自身本性的关注日益减弱，使得他的本性愈发成为一种病态的东西，使得社会及其表达机制所形成的铁板一块的那些现成观点畅通无阻。既然社会在此基础上作为一个铁板一块的组织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成为精神生活的一股势力，那么，面对这股力量，人的独立性的缺乏遂变得如此严峻，以至于他几乎不再需要他本身的精神存在了。他像一个失去弹性的皮球，盲目接受施加于其上的任何影响。他被芸芸众生玩弄于股掌，他从芸芸众生那里获得他为什么生活、他怎样生活的观念；以及弄清楚他所面临的问题究竟是民族的、政治的，还是出于他本人信仰或非信仰的。”总之，生于这样“一个拔了根，落了空的时代”（牟宗三），面对现代社会高度逼凌的态势，“我”遭受到了极度挤压：“社会及其表达机制”挤对我使我偏离了“我”，他人挤对我使我偏离了“我”（中国搞改革开放，引入竞争机制，由于缺乏良性的竞争环境，使得这一机制逐渐变成了“人挤对人”的机制，结果，“我”在这一过程中都被挤对得变了形），他人在挤对我的过程中因为发力过猛（反向补偿过猛）也使他们偏离了他们自己的“我”。整个社会都以失“我”为代价互相挤对着，致使“我”变得越来越苍白，人生越来越感到空虚彷徨、虚弱无力。

外在挤压固然可怕，而内在蒸发对“我”造成的流失其实更大。那么，将“我”活活蒸发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回答是：我的欲望。欲望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让欲焰烧起来往往很容易，但要将它扑灭，实在是太难了。由于“不听老人言”，我们将古人留给我们的“谆谆教诲”抛在脑后，致使我们亲手将“我”丢到了欲焰上煎考，最终“成就了”今天这样没有“我”的我们。造成今天这种“不听老人言”的结局，我们的“学者”们是难辞其咎的，因为他们为了打造自己的“体系”，对“老人言”任意曲解，致使“老人们”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在我们身上“现报”了。早在宋明时期，众大儒们就喊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没曾想我们这些后生们不仅未能“同情地”理解其中的真知



灼见，反而极尽其丑诋之语，以显得自己比古人高明。到了一切都“现报”之后，我们不妨再问自己一句：“我们所打造的‘体系’，真的比传统文化大缸里那点东西值钱吗？”同样是针对“存天理，灭人欲”，在一个还能够做到“同情地”理解的学者那里，古人的那点“心思”便昭然若揭了：“根据王阳明对人的见解来看，人的欲望首先应该被理解为那些阻挠和歪曲人成为他应该是的什么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阻挠意味着一个消极的限制，歪曲意指一个积极的赝品。于是，去人欲是指删除那些不但限制人的真正自我的全面发展而且也曲解了他的本来意图的真正本质的东西。”（杜维明）要做“我”，不要做“我”的“赝品”，这才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本义。

本来，我与“我”是“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关系，即是说，二者之间乃是十足的“同一性”关系。而现在，我与“我”分了家，结果就只能是我活得像“行尸走肉”，而“我”在一旁又“暗自神伤”。对于当代社会无“我”之人的真实处境，弗洛姆的相关描述最为到位：“易卜生描述了皮尔·盖恩特身上的这种自我性状态：皮尔·盖恩特试图发现他的自我，而他却发现他像一个洋葱头——人们可以一层一层地剥去葱皮，却没有发现任何骨骼。因为，人活着就不能怀疑自己的同一性，而在市场定向中，他一定发现这种同一性的确信并不诉诸他自身和他的力量，而是诉诸别人对他的看法。他的名声、地位、成功以及他被别人认作一个人这一事实，成了纯粹同一感的替代品。这种境况使他完全依赖于他人注视他和强迫他坚持扮演他曾经获得成功的那种角色的方式。的确，如果我和我的力量与每一个他人分离开来的话，那么，我的自我就会由我所取得的价格所构成。”当无“我”一旦主宰了人生，就必然“引起了人的极度空虚、无力、恐惧、不安的情感，对于死亡的、正趋衰亡的、非生命的、纯粹机械的事物的迷恋与日俱增。总之，人们被物质利益所支配，失去了创造力和生命力，这是当代社会的最大病症”。

一种思想、一种心声、一种言说，也就是道家所谓的“道”（“道”即有“言说”之义），一旦被作了过多的技术化处理之后，其中的“活性成分”（也就是“我”）就要受到损伤甚至要被扼杀：“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其结果就是，原本“切身”的“道”就会被“穿凿”成与“我”“隔”得厉害的“物”或“器”了，这一过程也就是道家所说的“朴散而为器”（老子）的过程。这样做，表面上看似乎是将学问做得越来越“规范”了、越来越“精致”了，实质上却是越来越

“堕落”了：“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老子）庄子所谓“道术”堕落为“方术”指的就是这一过程，而庄子所说的“方术”，其所指应当就是今人所说的“学术”。在时下中国的人文学领域，人们所做的最愚蠢的一件事情就是形而上得厉害，即人们总想从“充满活气”的现象界抽象出能够说明其“本质”的知识体系，好像不鼓捣出一个什么“体系”来就不叫学问似的。人文学一旦被“体系化”甚至“学术化”了，它也就脱离了它的亲切可人的性质，这样的“学问”很难有持久的生命力：“‘巧言令色’是为取悦人，‘理论修辞术’也是为取悦人。特别是当饰伪本身成为学科职业运作特点之后，正误标准不再是仁与不仁，而被技术化为是否合乎通行专业标准，‘取悦人’的态度也被制度化和效率化了”（李幼蒸），进而，“正确的废话”也就成了学界的“普通话”。就此，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一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不知要比那些蹩脚的“体系”要可爱多少倍！正是基于这一点，故古人有诗曰：“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吴可）。王国维曾有“可爱不可信，可信不可爱”之说，我以为此说大有问题：要是连可爱都不可信，那我们还能信什么？要是什么都不信，那我们还活着干什么？由此看来，王国维最终选择赴水而死，也算是“死得其所”吧！在人文学领域，可爱与不可爱之别就是温润的“我”与冰冷的“体系”之别，就是“有机”的（活的）学问与“无机”的（死的）学问之别。历史上，我们说不清老子、孔子、庄子的“学问”是什么“体系”（唯物耶，唯心耶；激进耶，保守耶；理性耶，非理性耶；进步耶，落后耶；传统耶，现代耶；对耶，错耶……），说得清的只是他们书中的那些只言片语——那些“有温度的”（活的）灵魂，这些灵魂与任何时代人的灵魂都是那么的相融无碍：“一座看不见的桥梁把一个又一个天才连结起来，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真正无可置疑的‘历史’。其他一切都只是梦一般变幻不息的过眼烟云，不善绘画者的不断的败笔。”（尼采）至于为了建立自己的什么“体系”而有意歪曲古人的思想，那就不仅不可爱，而是可恶了。这里顺便提一下孟子，孟子的学问做得不可谓不高深，不可谓不大气磅礴，但相对于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甚至“出言不逊”（如其所谓“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之类即是），孟子的言论往往就显得“太正确”了，也正是因为他的言论总是那么的“正确”甚至无懈可击，反而少了几分“真”，即反而少了孔子身



上那种亲切可人的东西。终至在儒家阵营中，具有“学术化”倾向的孟子，就只能做个大贤而已，与圣学尚有“一间之未达”。孔孟之别，实乃“求之于内”与“求之于外”之别，进而也就是“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之别。“己”属“内”，“人”属“外”，故孔子之学内在的“小体验”居多，孟子之学外在的“大道理”居多。“小体验”总有些“拿不上台面”的东西，“大道理”却难有“不正确”的时候。“小体验”中“我”多，“大道理”中“我”少，这便有了后人所谓“孔母孟父”之说。看来，“我”多的人（“我”多的学问），其亲和力就是要大一些。

都说“文章千古事”，文章（亦即学问）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评价，自然是因为它能“立言”，是人生“三不朽”之一。然而，学问这个东西有时就是很怪：你越是有意思“立”个什么“言”，这个“言”反而越是“立”不住。所以，我更倾向于将学问视为一种“代言”。代“谁”的言？这个“谁”既非古人也非今人，而是既超越古今又超越彼此的“我”，或者更确切地说，学问就是为人类找“我”的精神历程“代言”。某种程度甚至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丧“我”又不断找“我”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虽不免显得有些“折腾”，但这同时也恰恰说明，人类是不可能丧“我”的情况下让自己活得心安理得的，丧“我”有其必然性，找“我”也有其必然性。中国历史上就经常出现将那些丧“我”的文明“成果”砸得粉碎以便重新找回“我”的精神抗争，先秦道家、魏晋玄学（魏晋风度）、晚明“人文思潮”等等，都属于此类的精神抗争。也许我们还是有理由将人类的这一“折腾”想得乐观一些，即人类正是在不断迷失“我”又不断找回“我”的艰难历程中，从而使“我”获得了充分的“历练”，最后才终于使“我”“长大成人”的（详见拙文《文化：在两种相反方向力的作用下发展》，载《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3期，《新华文摘》1995年第10期作了论点摘编）。

在这样一个无比嘈杂、无比喧嚣的世界，我们的“我”还剩下多少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测试“我”流失的情况。比如，我们可以尝试着给自己提这样一类问题：我们能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得失吗？在人生的“紧要关头”我们还输得起吗？当我们孤身独处的时候能做到自得其乐吗？当我们从万人追捧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能做到没有失落感吗？我们能做到不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吗？或者，我们能做到如庄子所说的“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忤”吗？我们是真的需要那些东西而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自